

颠簸的日本

JAPAN IN TURBULENCE

薛君度 陆忠伟 主编

Chun-tu HSUEH and LU Zhongwei
Editors in Chief

时事出版社

颠簸的日本

薛君度 陆忠伟 主编



时事出版社



顛簸的日本

JAPAN IN TURBULENCE

薛君度 陆忠伟 主编

时事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颠簸

(陆忠伟)	(1)
一、政治航舵失控	(1)
二、政治体制“金属疲劳”	(2)
三、“平成维新”的助跑	(5)
四、日本领导人	(6)
五、面向新的“赶超”	(8)
六、历史十字路口与“日本丸”的车况	(9)
七、新政权的“历史重荷”	(11)
八、政局变动与国家战略调整	(18)
九、羽田内阁与政局走向	(22)
十、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27)
十一、“三王夺嫡”与“保保联合”	(34)
十二、森喜朗临危受命	(39)
十三、日本的国际地位	(46)

第二章 右倾思潮抬头

(马俊威)	(48)
一、修宪与护宪之争	(48)
二、“不战”与“侵略”之争	(57)
三、“普通国家”与“特殊国家”之争	(62)
四、“战后总决算”与“向右转”	(70)

第三章 日本经济的“1940 年体制”及“大爆炸”

(刘军红)	(80)
一、“隅田川模式”	(80)
二、“1940 年体制”	(82)
三、“护航舰队”的启动	(96)
四、日本模式的特殊性	(102)
五、日本版“大爆炸”	(107)
六、金融动乱与“复合型危机”	(109)
七、日美金融权力之争	(118)

第四章 日美关系的“漂流”

(杨伯江)	(128)
一、“冷战后”对日美关系的冲击	(128)
二、强化同盟的基本轨迹	(135)
三、在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背后	(144)
四、福音,还是祸水	(153)
五、无疾而终还是沦为一般	(160)

第五章 中日关系的“磨合”

(徐之先)	(168)
一、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演变	(168)
二、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升级	(198)
三、“强强”合作的前景	(219)

第六章 中日安全合作的昨天与明天

- (徐之先、袁蕴华等四人) (233)
- 一、如何正确看待昨天 (233)
- 二、如何做好今天的事 (242)
- 三、为了明天, 我们该做何努力 (255)

第七章 日俄关系的恩怨

- (刘桂玲) (262)
- 一、从日苏到日俄 (262)
- 二、日俄两国的“新思维” (276)
- 三、日俄关系的光和影 (283)

第八章 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调整

- (李志坚、程绍海、肖媛) (287)
- 一、外交关系 (287)
- (一) 以赔偿重返东南亚 (287)
- (二) 从“福田主义”到“宫泽主义” (289)
- (三) 从“桥本主义”到“小渊主义” (292)
- (四) 日本对东盟外交的战略意图和特点 (294)
- (五) 日本与东南亚发展关系的障碍及未来走势 (296)
- 二、经济关系 (299)
- (一) 东盟是日本的重要商品与资本输出市场 (299)
- (二) 战后全方位经济关系的发展及特点 (300)
- (三)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关系及其 21 世纪展望
 (311)

第九章 日本为什么不承认侵略

- (王俊彦) (317)
- 一、美国“新绥靖主义”的恶果 (317)
- 二、“皇国史观”阴影不散 (327)
- 三、新国家主义思潮死灰复燃 (331)
- 四、右翼思想的恶劣影响 (338)

第十章 日本文化与“神的国家”

- (〔美〕叶先扬) (345)
- 一、日本文化 (345)
- 二、日本哲学 (349)
- 三、日本的国民性 (352)
- 四、日本青年的“中国观” (356)
- 五、结论 (358)

第十一章 论中日关系：回顾与前瞻

- (〔美〕薛君度) (359)

主编简介 (365)

附 录 美国黄兴基金会简介 (367)

第一章 日本颠簸^{*}

一、政治航舵失控

战后日本最大的变化是以“经济大国”的称号为明治维新以来“追赶西洋”的国家战略划上了句号。它自身也在世纪交替之际进入“坐五望六”之年。问题是，这个50多岁的“经济巨人”的大脑中活跃着大量的政治细胞，而且在向全身急剧扩散。

对前50多年国家治理思想及政策的调整，涉及政治结构、行政体系、经济制度、外交政策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且与各党各派、各个阶层的既得利益密切相关，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调整及长期安排，需要有一批能够从时代高度来把握日本航向的政治家；需要一批能够按时代要求来推动日本转轨的行政官吏；需要为新的国家目标服务的政治、经济与行政制度。总之，它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战略工程。

所以，日本面临着“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危机”，亦即“第三个国家性的难关”（19世纪中叶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是第一个难关；二战失败是第二个难关），在日本还未实现其战略目标，其政治、经济、行政、外交的改革完成之前，整个日本的发展就必然是“漂流状态”，或者说，它的政府多半是软弱、不稳定及闭关自守的。

* 本章乃根据1995年以来所发表文章删改补充，就正方家。

处于“漂”状的国家，在政治上必然是“无政府”、“无主题”；在施政上必然是“短视”、“无为”，优柔寡断、对突发事件束手无策；在经济上必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去根良策。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家的离合集散、争权夺利；面对阪神大震灾、地铁沙林毒气、警察头目遇刺、日元汇率的急剧升跌而束手无策，都从不同侧面突显了“日本丸”在激流漩涡中航舵失灵的状况。

日本国宪法规定，“国会是国权的最高机构”，亦即为“日本丸”的掌舵机构。人们不仅要问，面对国家进路中的疾风暴雨，国会在干什么？政治家在干什么？日本一位笔锋犀利的已故著名评论家将不为政事、吵吵嚷嚷的国会讥讽为“国权的‘最低’机构”；指责日本的部分政客在“日本丸”行将倾覆之际，还在仓底打蟑螂。“政治的贫困”使人担心，日本向何处去？人们对一个国家走向未定、政治航舵失控、民族主义思潮抬头的日本，内心的担忧和疑惑是可想而知的。

二、政经体制“金属疲劳”

1945年美军占领日本，给日本人带去了美式“民主”、性解放和棒球。在扶日抗苏战略未最终形成之前，还搞了一阵“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经济民主化。这种在外部强大压力下进行的政经体制改革，奠定了日本的立国基础。

在迄今为止的50多年内，日本所赖以立国的是政治上的“55年体制”与经济上的“40年体制”。前者是指在美国支持下，日本自由、民主两大政党合并，组建成自由民主党，形成长达38年的一党执政态势。

后者则是指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主要要素，大多来源于战时的统制经济：如生产优先、否定竞争、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系统，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系统，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等等。这两大体制

实际上构成了战后日本的立国基础。

大和民族现在所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来自这个民族本身的成就。用一个西方流行的概念来表达，即所谓“日本病”。一位颇具声望的学者曾用“成功为失败之父”这句格言，来解释日本国力与国势变动的原因。换言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及为其做出重大贡献的政治行政体系影响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病起因于两大矛盾。一是经济赶超过程中染上的“发达国家病”：政府机构膨胀、福利开支增长、行政摊子铺大、生产效力下降。日本的病情虽然远未严重到欧美的程度，但一直是日本国家治理上的心腹之患。另一矛盾则是日本经济本身“循环不畅”所致，即内部市场先天不足而长期以出口牵引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施加的强大压力，引起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动。这种不平衡最终又形成迫使日本改革行政、经济体制的外压。80年代以来的日美贸易一揽子磋商中，美针对日国内流通体系、企业制度施加压力，就反映了这种矛盾。

50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撩开这个经济巨人的面纱时，发现西方国家的“富贵病”在日本已经颇为严重。一位资深日本专栏作家以犀利的笔锋称其为“三化现象”：

一为“世袭化”，国会议员20%—30%为子承父业，不但政界与经济界如此，体育、艺术、娱乐界亦然；

二为“官僚化”，即指机构臃肿、开支浩繁，形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大政府”。这种病态不仅表现在政府部门，连企业也循着“大机构”的路滑下去。据日本“办公自动化”协会的抽样调查显示，从1983年到1993年，主要企业中管理人员所占比重从19.1%上升为25.4%；

三为“族化”，即政党议员从所代表的产业团体利益出发，组合成一定的小团体，并和政府部门官僚抱成团，形成互为影响的命运共同体，诸如农林族、建设族、运输族等即为此类。

引发出忧国之论的除上述“三化”现象外，日本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动荡也被提高到了关乎国运盛衰的战略或历史高度来看。日本阪神地区大震灾，被认为是打碎了日本抗震工程的神话；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被认为是打碎了日本的“安全神话”；日元汇价暴涨、暴跌及股价低跌被认为是打碎了日本经济的“无敌神话”。于是，统治阶级中间兴起了一片忧国之论。

一些舆论甚至以“国运40年周期说”来解释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厄尔尼诺”现象。他们说，自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跨入资本主义门槛后，日本每隔40年就出现一个国运的隆盛或下降期：明治维新后约40年是日俄战争时代，1905年日本战胜了世界大国俄罗斯，作为东方新兴的帝国主义登上了世界舞台。而后的40年是日本发动接连不断的战争，侵华、侵亚、袭美，以失败而告终，即是国运、武运的衰退期。从1945年战败到1985年，则是日本国力恢复、发展期，经济实力跃居世界首位，实现了“赶超超英”的国家战略目标，形成了国运的另一次鼎盛，以1985年的日元汇率骤升为顶点，日本再次走上国运式微的周期，如海湾战争中被美欧摒于决策圈之外，随后经济受到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攻势，“泡沫经济”的崩溃及日元的连番暴涨加剧了产业空心化等等。

尽管这种周期论有唯心的一面，但它反映出日本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的困难与不安明显增长，中长期前景的动荡因素很多。50多年前，谁也未曾料到战败的日本会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但是已经有人担心，再过50年，人们会否以“过去完成时”的时态发出历史感叹：50年前，日本曾经是经济大国。

如果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日本现状做一诊断的话，人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在进入20世纪最后几年时，已出现了许多违反国家进路规律的现象：第一，自民党一党统治体制的崩溃；第二，“平成大萧条”的持续；第三，政官一体型体制的僵化。总之，战后日本赖

以立国与强国的制度架构已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疲劳”，它预示着日本国家发展战略转轨的困苦以及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的动荡。

三、“平成维新”的助跑

长期以来，日本统治集团出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及维持国家活力的考虑，开始对延续近 50 多年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实施重大的战略改革。鉴于改革的国策性、战略性，在前瞻日本走向时，必须分析日本正在发生的变化。

上述政治、行政、经济体制的改革涉及面很宽，具有调整国家战略的性质。它的成败将决定日本在 21 世纪的国势兴衰。如果以前述“55 年体制”来表示战后 50 年日本国家战略之核心的话，那么，日本垄断资本目前推动政府对国家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调整，即为日本的“平成维新”做思想、组织、财源上的战略准备。

目前日本统治阶层所考虑的一些方针和方案，具有国策的、战略的深远意义。经济领域推行的“放松管制”(DERAGULATION)主要是想加大竞争力度，以此来刺激国内低效产业的生产率，开放国内市场、抵御外来压力、建立产业整体竞争优势，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服务。

1995 年 3 月，日本政府提出了《放宽限制的五年中期计划》，同意在五年之内放宽 11 个领域 1091 项限制，从静态的现象看，这些措施仅仅是“小打小闹”，不足以促进民间经济活动自由化；无助于彻底消灭国内外差价及创建新一代产业，但鉴于改革的目标不仅注意当前，更考虑到下世纪的经济大竞争时代以及改革突破的意义，可以说这是继 80 年代中期的《前川报告》、90 年代初发表的有关“日美结构磋商”的《中间报告》、1993 年末的《平岩报告》之后的一次大范围政策调整。

政治领域的改革要以政策划线，与“55 年体制”诀别，形成

所谓的“政争型”政党制度，以增强政治家对国家大计的设计与治理能力。从1993年至1994年末。日本政坛新党林立、自民党与社会党握手言和、一年内四易首相，都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一部分老自民党员、老公明党员之所以能够摒弃前嫌走到一起成立新党，就是因为在新的国家战略思想上的一致。“新日本”的临盆与分娩极端痛苦。因为要为一个运行了近50年的机制动手术，确实有一大堆重要课题摆在它面前。改革进程的缓慢证实了这一点。

四、日本领导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在谋求国家发展上，靠机智、靠幸运、靠敏感，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惊涛骇浪中巧妙地掌握住了航舵。

吉田茂在日本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946~1954年)，五次组阁，执政7年零两个月。在战后重建日本的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亦是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基本路线的奠基人。中曾根康弘在1982年11月就任首相，执政伊始，便鼓吹建立一个“国际化日本”，从而揭开了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序幕。一些介绍日本的书刊称他为“第一位对日本的未来政策有清晰观念的首相”。也是在中曾根执政后，日本进一步完善了既作为“西方一员”又作为“亚洲一员”的对外立场。其他几位首相，如田中角荣以恢复对华邦交而名流史册；福田纠夫的对亚政策思想则被舆论提升为“福田主义”，对日本的亚洲外交产生了主要影响。

1993年以来的几位首相，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则基本上属于历史过渡时期的人物。1993年8月就任首相的细川虽仅当过两次议员和县知事，但它结束了长达38年的自民党一党统治，建立了联合政权，亦在日本现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故而，有专家称其推动了日本的“第三次政治开国”。村山富市力争

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体现了政治家的良知和时代感。

把上述日本首相放在 50 多年来国际国内纷纭反复的政治、经济图景下加以衡量，则基本上都属于“内向型”政治家。因为，他们执政于一个日本没有外交思想的年代，其所有的精力就是对美称臣，推销商品；对内则凭借权谋智术，在被评论家称之为“战国时代”的政坛上，五党角逐、六派争雄，造成政党谋略的发达及国际战略思维的退化。

当战后史掀开新的一页，欧亚地缘环境大变动及整个亚太力量格局从美国一极突出的“高峰型”，向龙腾虎跃的“高原型”演变时，国际政治经济的风风雨雨亦开始要求日本的首相具有“洞察世界与日本”的能力，而决非仅是纵横捭阖、翻云覆雨，挟鬼谷之术，奔走于派阀与财阀之间。

日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的政治家在思考是否应调整其国家战略的坐标轴。这种调整实质上是要同沿袭了半个世纪的外交、经济、政治惯性较量。故而，日本传媒在分析该国跨世纪的首相应具备的条件时，把洞察力、结合力、说明力和时代感觉这四项条件作为一个标准。换言之，时代要求日本出一个华盛顿，以将日本引向安全、和平、生活高质量的历史新阶段。一些政治家提出了“生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但也有些人则提出了“政治大国”的方向，主张不应该是“政治三流”的“小脑袋恐龙”，而应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政治大国、军事强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歧见，不仅意味着政界各股势力的大较量，它还象征着一些新人物将陆续进据要位，或登上政治舞台。

当然，这个转折不会是一次告成的。因为，一方面在现阶段日本选民喜欢“非霞关型”（霞关是日本政府机构集中地）、“非政党型”。1995 年日本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与大阪两大政治、经济中心的当选者出人意料竟是无党派人士。另方面，一些年轻有为的官员不敢轻易“下海”（进入政界），只是作壁上观；尽管一些

有为者已建立新党，但日本政坛仍是涛声依旧。

五、面向新的“赶超”

50多年来，研究日本的专家、学者不断地提出有关日本国势、走向的命题，并出版了不少名著，然而，在其主要神话（社会安定、政局稳定、经济不死鸟）已经破灭的情况下，人们不禁更关心其下世纪的走向与潜力。

美英法等国的部分学者提出了日本走向“西化”论的观点。他们以日本的神话已经结束为依据，认为内斗与内讧分散了政治的力量。“日本正在缓慢但却是肯定地向一种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方向演变；故而，“任何形式的发展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殊途同归于唯一的‘真正’范例：西方模式”。

另有部分学者坚持“异化”论的观点，认为日本“正在从它经历的危机中变得强大起来，西方再次低估了日本的实力”。他们的依据是，工业卡特尔体系仍将变相存在；日本领导人仍将把经济作为一种权力工具，而非用于改善公民生活条件。通过把大量的储蓄引向战略产业领域，“就能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

日本的困难确实不少，最严重莫过于缺少了“赶超样板”，科学技术上，模仿的道路越走越窄；海外市场的“壁垒”越来越高；民间资本的活力也有所减弱，发展维艰将成为下世纪日本国家运作的主题词。如何创造条件、如何图存发展，有待日本自己努力。

日本经济界有一种看法颇有新意。它认为，90年代中期的日元汇价急速攀升的大背景是（日本模式、美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在冷战后爆发的、以货币为媒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激烈竞争。日元所代表的日本型资本主义可能在今后若干年仍然具有凌驾美欧的发展势头。

为迎接下一个50年，日本统治集团开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领域组合力量，排开阵势，例如，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的合并，为日本金融机构在资金规模、经营范围上凌驾欧美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政治领域的“分化组合”仍在进行，这种组合不会是一次成功的，但其新党形成之时，亦是政局稳定之日，如果做一个大胆的预测的话，可以说，一个或几个具有“革新”思想并具备政治实力的战略梯队正在观望国家的走向或政局的发展，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即会跃上政治舞台。这将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无形”要价力量。

面向 21 世纪的日本，将是一个新日本。国际社会期望它能选择一个正确的航向，看到一个揭开面纱的善良、美丽的新娘。

六、历史十字路口与“日本丸”的车况

1993 年以来日本走马灯似地更换首相，宫泽、细川、羽田、村山、桥本、小渊直至森喜朗，平均每个首相的任期不到一年。如此剧烈的政局动荡，是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格局变化的大背景分不开的。换言之，日本正处在一条漫长而充满动荡的又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也是一条与政治、军事交叉的超级公路，这种交叉将给日本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外交变化。形象地说，要顺利通过这条公路，到达运行的终点，需要驾车技能、车况与路况三个条件。

从车况亦即日本这个国家现阶段的“段况”看，它已出现了四种病态：

第一，“癌细胞扩散症”。这个战后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年过半百的“经济巨人”的大脑中，出现了大量非常活跃且向全身急剧扩散的政治、军事细胞，不时引发上层的冲动。病变的结果，无非是几种可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军国主义，从现阶段看，突

出军事、突出政治的大国主义、民族主义及修宪思潮急速抬头。

战后 50 多年来，研究日本的学者不断提出有关日本走向的命题，出版了不少名著，如布热津斯基的《脆弱的花朵》（以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经济安全系数低为背景）；傅高义的《日本名列第一》（以日本跃升为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资本输出大国为时代背景）；英国驻日记者的《太阳西沉》（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一蹶不振为时代背景）。如果有学者以日本的跨世纪走向、现阶段“段情”为题材著书的话，其主题很可能是《从商人到武士》或《第三次远航》等等。

第二，“历史更年期”。日本正处在继明治维新、战后改革后的另一次巨变时期，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开国”。作为更年期的生理反应，就是政治航舵失控，政治力量离散聚合频仍，社会萌生乱象，民族主义抬头及沮丧心理蔓延。社会矛盾激化也是更年期的主要表现。从 1995 年的“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案，到最近一系列使用青酸甲、砒霜、消毒剂投毒案件的发生，整个社会弥漫恐慌心理。

第三，“体制疲劳症”。战后半个世纪，日本赖以强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疲劳。”其一是政治上称之为“55 年体制”，也就是从 1955 年到 1993 年，长达 38 年的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常年“陪衬”，保持政局稳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1993 年 7 月自民党下台引发的政潮，至少还将经过多次“血与火”的洗礼，到 2005 年前后，基本上才会尘埃落定。其二是经济上称之为“40 年体制”的弊病积重难返，也就是产生于战争年代、形成于战后、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为亚洲国家起过样板作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出了问题。为此，日本从 1998 年 4 月推行了称之为“大爆炸”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也产生了巨大的震荡。

第四，“水土不服症”。在对外关系及外交战略上，战后以日美关系为主的基本战略还未彻底调整过来，其外交经常陷入一些“陷